

# 医巫闾山辽陵研究的几个问题<sup>\*</sup>

董新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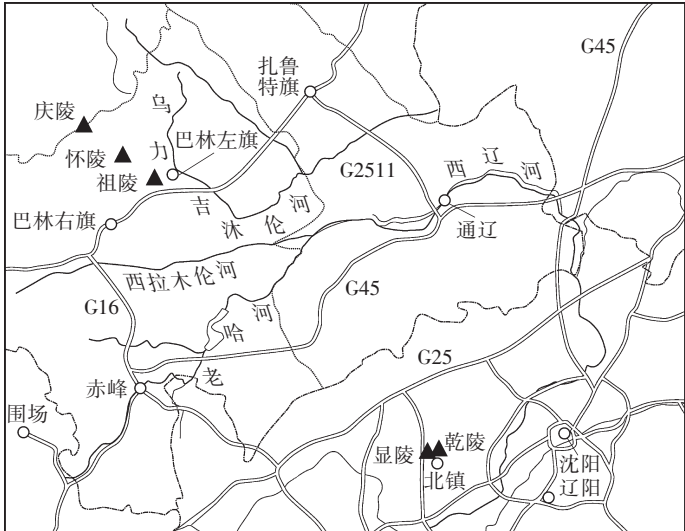
辽代共有五处帝陵。其中祖陵、怀陵、庆陵位于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侧)西北的大兴安岭山区,显陵、乾陵

位于辽东京辽阳府(陪都,东丹国都城,今辽宁省辽阳市)西北的医巫闾山地区(图一)。两个陵区明显蕴含着不同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底蕴。

因此,学界通常认为辽陵有两个大的陵区,即上京的大兴安岭陵区和东京的医巫闾山陵区。

医巫闾山陵区内,显陵与乾陵相邻,地处医巫闾山中段中麓东南侧,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山谷,同时联系紧密。二陵的奉陵邑相距仅 3.5 公里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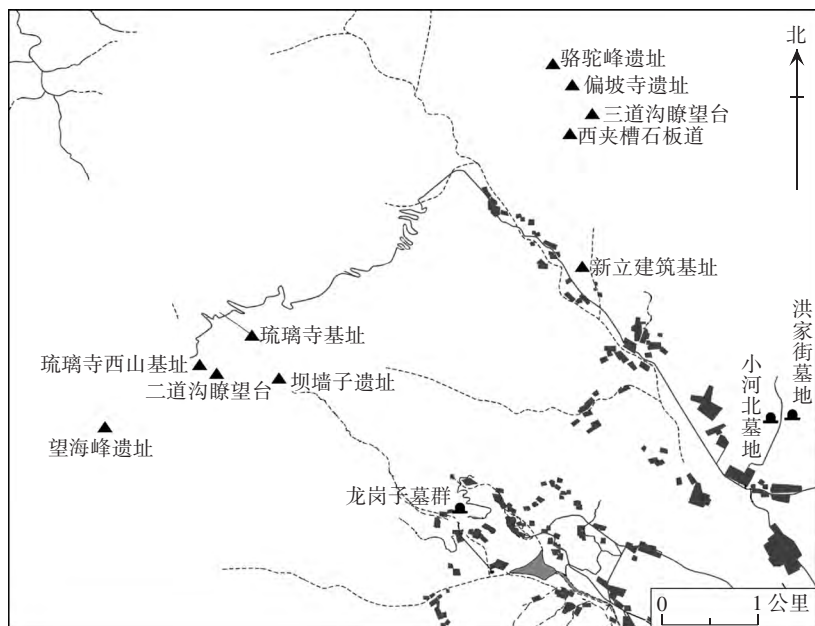
根据《辽史》记载,显陵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东丹国人皇王、“义宗”耶律倍和辽世宗耶律阮的陵寝之地。其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街道龙岗村一带山谷,当地人俗称“二道沟”的区域内<sup>①</sup>。乾陵是辽景宗耶律贤和皇后萧绰的陵寝之地,位于邻近的新立村一带山



图一 辽代帝陵分布示意图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5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优势学科资助计划(项目编号:DF2023YS14)、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项目编号:2024CCXZ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图二 辽显陵和乾陵遗存分布图(据《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 2015~2018 年发掘简报》图二改绘)



谷,当地人俗称“三道沟”的区域内<sup>[2]</sup>。天祚皇帝耶律延禧被金人附葬于此。

1933年,金毓黻曾对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进行过实地调查,开启了医巫闾山辽陵历史考古研究的序幕。1970年以来,曾清理过几座被盗墓,有辽魏国王耶律宗政和郑王耶律宗允墓<sup>[3]</sup>,辽广陵郡王耶律宗教墓<sup>[4]</sup>和龙岗子四号墓<sup>[5]</sup>等。对医巫闾山辽陵的主动性考古工作,大致始于2012年<sup>[6]</sup>。考古工作者清理了显陵的琉璃寺西山基址和琉璃寺基址<sup>[7]</sup>,发掘了乾陵的新立建筑基址(简报称新立遗址一号基址)<sup>[8]</sup>等重要的祭祀建筑基址。虽然尚未确认显陵和乾陵玄宫的准确位置,但也发现并部分清理了一些大墓。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新立建筑基址西南发现了一座全长84米的巨型墓穴(编号M1),在基址西北(后侧)也发现了一座大墓(编号M2)<sup>[9]</sup>。此外还清理了乾陵重要的陪葬墓地——大丞相韩德让家族墓地(洪家街墓地)<sup>[10]</sup>和齐国王耶律隆裕家族墓地(小河北墓地)<sup>[11]</sup>等。这些全新的考古发现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极大推进了医巫闾山辽陵的整体研究。

检索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医巫闾山辽陵的几个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 一 医巫闾山辽陵选址和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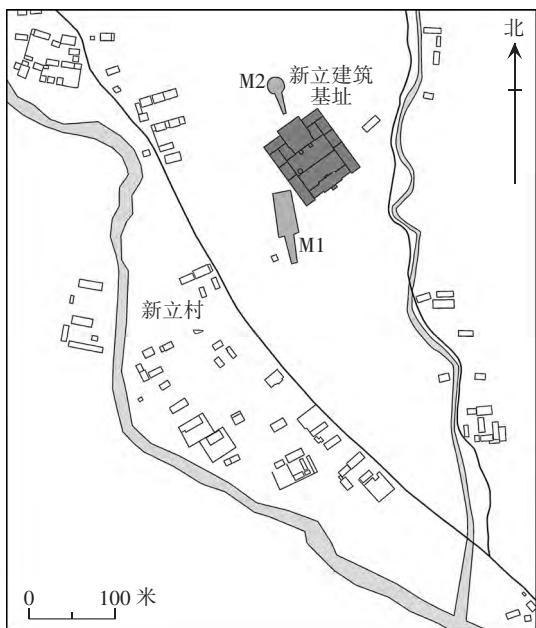
辽上京始建于神册三年(918年),是辽代营建最早、使用最久、最重要的都城。耶律阿保机驾崩后,于天显二年(927年)葬在西距上京约20公里的大兴安岭余脉的大布拉格山谷中,史称“祖陵”。这与唐陵择地近都,位于都城西侧的规制相合。辽祖陵是大兴安岭陵区的第一座帝陵,是契丹辽王朝的“祖”陵,代表契丹辽王朝的正朔地位。其后太宗耶律德光的怀陵和圣宗耶律隆绪的庆陵,均为辽朝统治者彰显正统的典型代表。换言之,大兴安岭陵区是契丹辽王朝正统的象征,是其有效专制统治的物化形式。

医巫闾山陵区包括显陵和乾陵(图二)。下面分别对二陵选址和定位进行分析。

### 1. 显陵不符合辽代帝制

分析史料可以确知,显陵在辽代五处帝陵中,是比较特殊的存在,不符合帝陵规制。

首先,耶律倍以“文武元皇王”即亲王身份下葬。耶律倍是太祖耶律阿保机嫡长子,曾贵为“皇太子”,东丹国王。但耶律阿保机驾崩后,在代表游牧文化保守势力的皇太后述律平操纵下,皇位被其二弟“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



图三 新立建筑基址和 M1、M2 位置示意图(据《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 2015~2018 年发掘简报》图三改绘)

光所得。代表崇尚汉文化革新势力的耶律倍争夺皇位失败后,逃亡到中原地区后唐为官,后被弑杀。当朝皇帝、其亲弟太宗耶律德光将其遗骨取回,以“文武元皇王”的亲王身份改葬在医巫闾山东麓。耶律倍嫡子耶律阮即位后,才追谥其为“义宗”,墓地升格迫认为帝陵。医巫闾山曾是东丹国王耶律倍的辖区,距东丹国首府东京城约 150 公里,是耶律倍生前最喜欢的地方,他曾在此修筑望海堂。其东南坡是辽河下游的吉地。太宗耶律德光以耶律倍生前喜爱医巫闾山山水奇秀之故,将其归葬于此,并修建影殿。可见,“耶律倍墓”最初不是按帝陵规划的。

其次,耶律阮也并非按帝陵规制正常埋葬。世宗耶律阮是耶律倍嫡长子,在诸大臣拥立下,暂时战胜了本土保守势力代表——其奶奶太皇太后述律平和三叔父耶律李胡,继承其二叔父耶律德光之位,成为辽朝第三任皇帝。其在位期间,被本土保守势力的政变臣子弑杀,属于非正常死亡。更为重要的是,皇位继承者为太宗耶律德光嫡子、其堂弟耶律璟,而非世宗耶律阮嫡子。或许出于政治考量,穆宗耶律璟没

有给世宗耶律阮营建独立帝陵,而是将其附葬于显州西山,与其父耶律倍合葬同一陵区。

第三,“文武元皇王”(义宗)耶律倍和世宗耶律阮的玄宫位置符合契丹贵族家族葬制。尽管二者玄宫位置不详,但其献殿位置大致可定。综合考古资料,琉璃寺西山基址建筑体量略小于琉璃寺基址,其所在院落坐西朝东,很可能是“文武元皇王”(义宗)耶律倍玄宫前的献殿。琉璃寺基址坐西朝东,建筑体量较大,也较为讲究。在琉璃寺基址采集的残碑上刻有“原系大辽东丹口让皇帝”,很像是介绍其先祖用语。故推测此基址应与世宗耶律阮玄宫前的献殿有关。根据祖陵玄宫与献殿、耶律李胡墓与献殿的相对位置推测,“文武元皇王”和世宗的玄宫都应位于献殿附近的山脊上。目前所见契丹贵族墓地墓葬排序方式,通常是祖墓居南,子墓居北,斜向排列<sup>[12]</sup>。由此推测,居西南者为义宗耶律倍陵,居义宗陵东北者为世宗耶律阮陵。若此不悖,这应是显陵考古研究的重要收获。

第四,显陵地势高,范围小。根据考古资料,“文武元皇王”(义宗)耶律倍和世宗耶律阮的玄宫和献殿,均位于医巫闾山中段巍峨山岭之上,地势很高,范围局促,不利于祭拜。世宗献殿(琉璃寺基址)和乾陵景宗献殿(新立建筑基址)高差达 500 米。可见显陵与其他辽陵营建在一个较大山谷中的情况不同,是建在山顶处的小型茔域。

义宗耶律倍和世宗耶律阮的玄宫都位于医巫闾山东麓山峰之上,相距不远,显然是父子合葬的布局安排。穆宗耶律璟没有给世宗耶律阮单独置陵地,亦未建陵号,明显有在政治上排除异己,否定其皇位正统性,刻意贬损之意。整体看来,显陵具有特殊性,不具备典型的辽代帝陵选址特点,其陵寝制度与其他辽代帝陵不同。这是我们深入研究辽陵时要关注的。

## 2. 乾陵是政治博弈的产物

根据《辽史》记载,景宗耶律贤是耶律倍嫡孙、世宗耶律阮嫡子。从景宗开始,耶律阿保机嫡长子耶律倍一脉子孙持续成为皇帝,结束了

游牧文化保守势力(世选可汗制)和崇尚汉文化革新势力(嫡长子继承制)争权局面。辽朝统治者效仿中原王朝传统,确立了“家天下”的嫡长子继承制统治秩序,使皇位继承彻底代替了可汗世选。辽乾陵正是在游牧文化保守势力和汉文化革新势力角力的关键时期选址营建的。基于上述复杂的政治背景,乾陵形成了承前启后、富有自身特色的辽代陵寝制度。

景宗帝陵没有选择辽上京大兴安岭陵区,而选择辽东京医巫闾山陵区,是辽朝统治者政治博弈的结果。景宗耶律贤虽执政13载,但其势力集团还不够强大。让年仅12岁的嫡长子耶律隆绪即帝位,已经是景宗政治集团在政治博弈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但皇帝尚小,承天皇太后萧绰只能临朝听政。为避免游牧文化保守势力对新政造成毁灭性打击,维护新皇帝耶律隆绪统治的稳定发展,“垂帘听政”的承天皇太后决定将景宗陵地选在景宗和太后本人家族势力的传统控制范围,即医巫闾山陵区。承天皇太后在韩德让(后被赐名耶律隆运)、耶律斜轸等名臣的辅佐下,不断推进契汉融合,经二十余年有效治理,取得了对内对外的一系列成功,基本化解了契丹皇室宗亲争夺“世选可汗”的反叛势力,同时与北宋签署了“澶渊之盟”。这为后期圣宗耶律隆绪亲政,辽朝政权稳固,国泰民安,国势达到鼎盛奠定了重要基础。

根据考古资料,琉璃寺西山基址、琉璃寺基址和新立建筑基址分别是文武元皇王耶律倍、世宗耶律阮和景宗耶律贤的献殿。从献殿位置推测,三者玄宫也应大体排列有序。文武元皇王陵作为祖墓,居西南,世宗玄宫和景宗玄宫沿东北斜向分布,符合契丹皇族和高等级贵族的葬法顺序<sup>[13]</sup>,也是效仿中原汉式家族葬的体现。



图四 新立建筑基址平面图(上为西北)

(引自《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 2015~2018 年发掘简报》图五)

万雄飞等认为:“辽乾陵陵园可能包含了医巫闾山中段东麓的二道沟和三道沟两个山谷。二道沟与三道沟是近现代的地理概念,而在辽代可能把二道沟与三道沟视为一个整体来作为乾陵陵园。这个陵园内包含了显、乾二陵的玄宫与陵寝建筑,其布局形式与辽庆陵相同,即多陵共用一个陵园。”<sup>[14]</sup>我们认为将显陵归入乾陵的认识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显陵是王陵葬制,是葬者被政治歧视的缩影,不是标准的辽代帝陵规划。而乾陵是按辽代帝陵传统规划的,是新建的一个独立陵园。孙辈将祖父和生父的陵园,纳入自己的新陵园似乎不合礼制。但择吉择近与显陵发生联系,正是乾陵选址的独到之处之一,也体现出中国古代堪舆术的博大精深。乾陵在陵区构成和陵园布局等方面前承祖陵、怀陵,传承有序,后对庆陵陵寝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认为显陵和乾陵是两处不同性质的帝陵,各有规划和布局,不宜混为一谈。



图五 新立建筑基址正殿台基(TJ1)平面图(上为西北)(引自《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 2015-2018 年发掘简报》图八)

由此看来,医巫闾山陵区自始至终,都有非辽朝正统帝陵规制的意味。

## 二 新立 M1 和 M2 的墓主身份

乾陵陵园依托医巫闾山北镇段东麓的“三道沟”而建。“三道沟”为三面环山的簸箕形山谷,东南方向为敞开式漫坡,与祖陵和怀陵陵园四面环山略有不同。目前尚未确认景宗玄宫,不过已发现两座大墓和诸多重要地面遗迹。

新立建筑基址是乾陵陵园内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建筑址。学界通常认为新立建筑基址是景宗玄宫前的献殿。较为重要的是,在新立建筑基址西南发现一座巨型墓(编号 M1),在基址西北(后侧)不远处,发现一座大型砖石墓(编号 M2)<sup>[9]</sup>(图三)。两墓位置特殊,墓主身份为学界关注。

### 1. M2

位于新立建筑基址北部。解剖发现,墓葬方向 168°。墓道两壁用土坯和青砖砌筑,表面抹黄泥,底部用双层方砖砌成规整的台阶。砖石混筑墓室全长约 44 米。参考庆陵东、中、西三陵的玄宫和陵前献殿的位置关系,发掘者认为 M2 位于陵前献殿北部,推测其为景宗玄宫<sup>[10]</sup>。我们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 M2 可能是景宗皇后

萧绰的玄宫。

第一,目前发现的辽代帝陵均凿山为陵,即在山脊上仿唐陵修筑玄宫。辽太祖的祖陵,太宗的怀陵,圣宗、兴宗、道宗的庆陵均如此,推测景宗玄宫应无例外。根据考古资料,新立建筑基址北部和 M2 周边都是自然冲沟的垫土,经统一规划平整。将景宗玄宫放到冲沟里营建,显然不合辽代帝陵的选址制度。

第二,祖陵玄宫距“膳堂”约 180 米,庆陵东、中、西三陵玄宫和陵前献殿间距分别约 120、150、350 米,可见辽代玄宫与献殿距离通常在百米以上,而 M2 距离陵前献殿仅约 5 米,显然不合辽陵葬制。因此,我们认为景宗玄宫应建在新立建筑基址西北更远的山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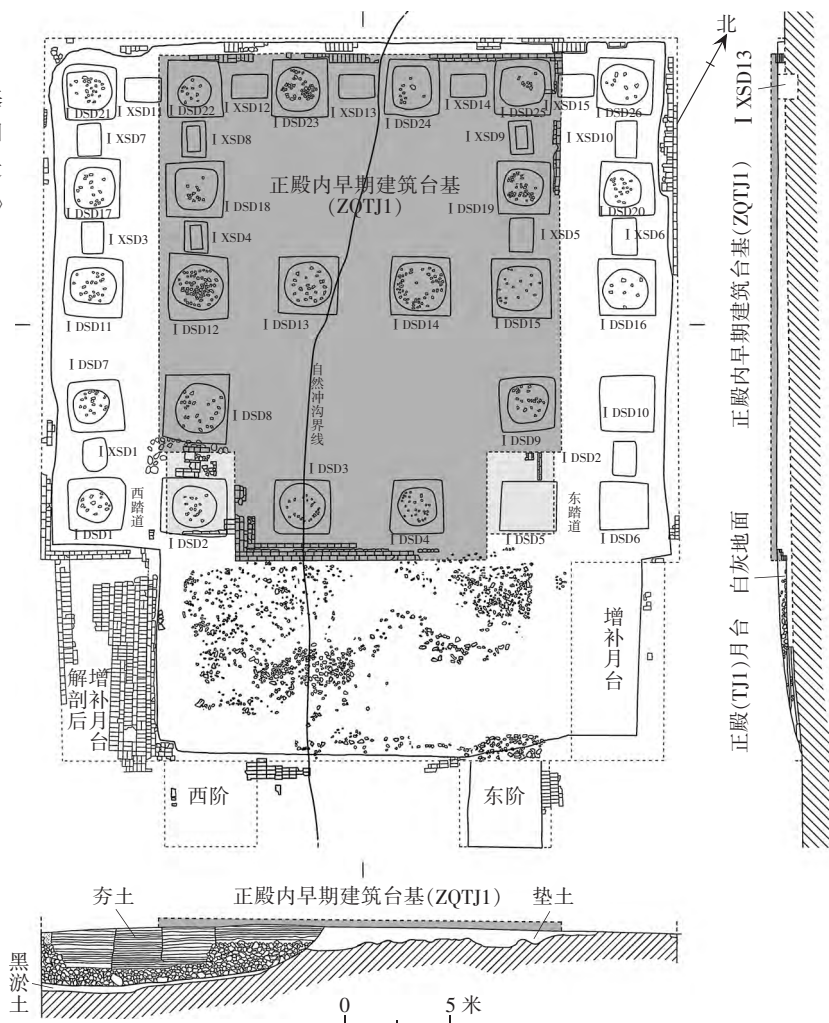
第三,根据文献,皇太后萧绰晚于景宗 28 年驾崩,且“垂帘听政”多年,相传与大丞相耶律隆运还有特殊关系,因此,萧绰很可能单独下葬,未与景宗合葬。其墓葬选址于景宗玄宫和献殿间较为合适。

综上所述,M2 地处自然冲沟内,又紧邻献殿,显然不可能是景宗玄宫。按辽帝陵均凿山为陵的礼制,再综合研判现有遗迹现象,我们认为介于景宗玄宫与献殿间,位于冲沟内的大墓很可能是“垂帘听政”多年的皇太后萧绰玄宫。圣宗耶律隆绪为其母后单独修筑玄宫,彰显其尊贵地位。同时,皇太后玄宫从地势到规模,都应低于景宗皇帝玄宫规制。因此,M2 应是景宗皇后萧绰的玄宫。

### 2. M1

位于新立建筑基址西南侧,二者最近处仅约 0.5 米。该墓无封土迹象,与献殿距离极近,但二者无叠压打破关系。墓葬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生土,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天井和墓室组成。墓葬方向 178°。墓圻全长 83.7 米,墓室底部距地表约 13.8 米。墓道平面近梯形,长 33、宽 5.8~10.8 米。墓道东侧圻边外折呈三段状分布,推测填土下有二层台。墓道填土自南向北,中部为黑褐色沙砾土,两侧为黄褐色沙砾土。局部解剖显示,黑褐土打破黄褐土,且两种颜色的填土均经人工夯打,推测该墓有二次

图六 新立建筑基址早期台基(ZQTJ1)及晚期台基(TJ1)平、剖面图(据《辽宁北镇新立辽代遗址一号基址 2018 年发掘简报》图六改绘)



下葬现象。墓道填土内出土 1 件兽面纹瓦当残件,瓦当边轮较宽,兽面外饰连珠纹,兽面顶部有一“王”字。墓道中部有 1 个祭祀坑,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墓道填土。坑口平面近圆形,不规则弧壁,锅底状坑底。坑口直径 2.9、深 1.8 米。祭祀坑填土内置有 1 件泥质灰陶罐。天井平面近长方形,长约 24、宽 10.2~11.7 米。天井两侧分布有成片石块,北部居中有 1 个盗洞。坑口平面呈圆形,直径约 2.5 米。推测盗洞下为墓门位置。墓室平面呈梯形,长约 39、宽 21.3~24 米,内填黄褐色沙砾土,经人工夯打。

辽代高等级贵族墓,特别是帝陵陪葬墓,都会选择一处风水上佳之地,通常与帝陵或献

殿等有一定距离,体现出帝陵的规划性。但 M1 与献殿最近处仅约 0.5 米,很可能并非乾陵最初规划的内容,更像是临时下葬。

在平地凿坑修筑 M1 的做法,与金代贵族墓<sup>[17]</sup>相似,而与辽代贵族墓依山而建的风格不一致。其墓道填土中的兽面瓦当应是金代遗物,故推测墓葬应营建在金代。此墓位于景宗献殿旁,实行平地土葬,似乎不是景宗直系子女的祔葬墓。结合金初统治者正式迁葬天祚帝到乾陵的记载<sup>[18]</sup>,及景宗献殿和世宗献殿等在金初均曾大规模重修的迹象<sup>[19]</sup>,M1 很可能是金人迁葬的天祚帝的玄宫。其墓体量较大,或许体现了金人对契丹人的安抚。《金史》载,萧仲



图七 新立建筑基址出土琉璃瓦当(T2209③:30)  
(引自《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 2015~2018 年  
发掘简报》图二五)



图八 新立建筑基址出土琉璃檐头板瓦(T2508②:156)  
(引自《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 2015~2018 年  
发掘简报》图二九)

恭等契丹旧臣都参加了此次安葬仪式<sup>[20]</sup>。

### 三 新立建筑基址的形制结构和营建次第

新立建筑基址是乾陵陵园内最重要的建筑基址。其位于陵园内东南部的二级黄土台地上,地势平坦,海拔约 120 米,接近“三道沟”沟底,东南距北镇市富屯街道新立村樱桃沟村民小组约 100 米<sup>[21]</sup>。其所在位置原有冲沟,用积石和建筑废料填平做基础,该选址显然经过精心规划。

#### 1. 形制结构

新立建筑基址是一处由廊庑围合的长方形院落,东南向,由东南部门殿、西北部正殿和四周廊庑组成(图四)。院落东西宽 78.4、南北进深 91.5 米。院落墙外有排水沟,西高东低,排水

至东南部,再流向台地东侧的樱桃沟。沟内曾发现一处排水口,为一雕刻精美的石螭首吐水。吐水前方有方砖铺地面,后部连接有排水管道<sup>[22]</sup>。

门殿位于院落东南部居中,由台基和南、北两侧踏道组成。台基东南部被冲沟破坏殆尽,内部夯土裸露,台面铺砖和柱础均不存。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侧东西残面阔 21.6、北侧东西面阔 23.8、南北进深 13.8 米。根据台基上 18 个礅墩的柱网布局可知,门殿为面阔 5 间、进深 2 间的殿堂式建筑。

台基南北两侧居中各有一踏道,均保存较差。南踏道体量略大,呈斜坡状,两侧用青砖包边,内部为黄色夯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面阔 6.5、南北进深 3.8 米。北踏道仅存底部一单排砖砌边框,平面呈长方形,面阔 4.8、进深 1.5 米。

正殿位于整组建筑中北部,面向东南,方向 151°。台基主体为黄色夯土,四壁用青砖包砌。壁面有二次包砌迹象。内侧(第一次)用小毛砖和不规则青砖混合包砌,用白灰做浆。外侧(第二次)采用磨砖对缝工艺,用规整青砖包砌。台面外残存地面铺砖。

正殿由台基、月台和东、西二阶组成(图五)。台基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面阔 29.6、南北进深 24.3 米。台基台面已被破坏,现存台台北高南低,呈漫坡状。根据台基上 26 个大型礅墩的柱网布局可知,正殿殿身为面阔 5 间、进深 4 间的大型建筑。台基中部有减柱现象。当心间、次间、稍间开间均约 5 米。大礅墩平面近方形,边长 2.5~3.1 米,其上础石均无存。其间分布 15 个小型礅墩,平面呈长方形。其中 3 处残存一大小相近的长方形础石,长 1~1.2、宽 0.5~0.6 米。

月台位于正殿台基中南部,保存较差,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28.4、宽约 9.4 米。外壁包砖仅存西部残段,内部夯土中部含较多填石,两侧较为纯净。东、西二阶对称置于月台南侧,保存较差。西阶几乎无存。东阶残存基底,内部为黄色夯土,外部残存青砖包边,平面呈长方形,长约 4.1、宽约 4.3 米。

廊庑左右对称分布于门殿和正殿两侧,并

与门殿和正殿共同组成封闭的长方形院落。两侧廊庑从门殿至正殿,由多个高低不同的台基依次连接组成,东南低,西北高,台基高度逐级抬升。西廊庑保存相对较好,东廊庑多数被冲沟破坏。西廊庑分门殿西侧挟屋、正殿西侧挟屋、西侧长廊三部分。

庭院由门殿、正殿及两侧挟屋和东西两侧长廊庑围合而成,南北长 61.8、东西宽 53.4 米。庭院地面自门殿至正殿,由南向北可分三级。每级地面均北高南低,呈漫坡状。庭院地面直接在生土上平整加工,用白灰做底,上铺方砖。第二级庭院西南部有一六边形建筑基座,边长 2.9 米。外为青砖包边,内为黄色夯土,推测为经幢基座。

## 2. 性质和年代

新立建筑基址是乾陵内景宗玄宫前的献殿,这一结论基本为学界认可。但对其废弃年代,学界有不同认识。

万雄飞认为,新立遗址一号基址(新立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为辽代中期,是乾陵御容殿遗址,《辽史》称之为“玉殿”。大殿屋顶绿琉璃瓦的更换与辽道宗大康三年(1077 年)修乾陵庙有关<sup>[23]</sup>。

我们认为新立建筑基址始建年代为修建景宗乾陵之时,即发掘者认为的辽代中期是合适的。但其废弃年代应该到了金代早期。

## 3. 营建次第

根据考古资料,正殿和月台均有二次营建或修补的现象。新立建筑基址正殿(TJ1)下叠压了一座结构完整的小型早期殿址(ZQTJ1),二者方向一致,均为东南向(图六)。发掘者在 ZQTJ1 台面上没有发现礲墩,故认为:“在营建 ZQTJ1 的过程中,营造者可能改变了原有规划,将其改扩建为正殿台基(TJ1),即 ZQTJ1 是一个并未建完的半成品。”<sup>[24]</sup>这个认识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认为,辽代帝陵的献殿规划设计,一定是由宫廷高水平“设计师”来完成的,不可能也不允许存在规划错误的行为。考古发现的早期殿址结构完整,台基壁面有包砖,是一次正常的建筑行为。因此我们推定,景宗献殿曾经过

两次大规模营建工程,晚期殿址还存在多次补修迹象。

早期殿址:第一次营建应为景宗下葬之时(983 年)。沿袭祖陵和怀陵的献殿传统,景宗下葬时,献殿还是单体建筑,没有四周回廊和院落。早期献殿分为主殿、月台和东西踏道三部分(图六)。主殿台基平面呈方形,边长 18.7 米,四周用青砖包砌。台面上没有发现礲墩(是否晚期沿用早期礲墩,待考)。推测殿身建筑面阔 3 间、进深 3 间。早期台基的长方形月台较小,长 11.7、宽 5 米。夯土中部含有较多填石,与祖陵甲组建筑基址西侧佛殿的月台情况一致。东、西踏道用青砖砌筑。早期月台外有地面铺砖。地面用白灰做浆,是辽代殿址的常用做法。

晚期殿址:第二次营建为承天皇后萧绰下葬时(1010 年)。新建的献殿格局发生变化,由单体建筑改为殿院式建筑。

或许因为朝廷政局稳定,经济富足,圣宗耶律隆绪为其母后皇太后萧绰重建了献殿,不仅体量变大,形制和布局也有所变化,将原有的单体建筑改为长方形院落,包括东南部门殿、西北部正殿和四周廊庑(图四)。长方形正殿台基,东西面阔约 29.6、南北进深 24.3 米。正殿殿身为面阔 5 间、进深 4 间的大型建筑。承天皇后萧绰驾崩时,正是辽朝政治经济发展的高光时刻。圣宗为展示孝悌之心,重建体量更大的献殿是合乎情理的。晚期月台在早期月台基础上,向东西两侧扩大,有明显增补迹象。经解剖,西侧增补月台的堆积中包含较多碎砖瓦及少量带有红彩的白灰墙皮,底部残存原月台旁庭院地面铺砖。现存月台在原月台两侧等距各加宽 4.3 米。圣宗在为其母后重建献殿时,新增设了回廊院落。这是辽陵陵园献殿形制的新变化,是辽陵陵寝制度的重要变革之一。

晚期献殿应经多次补修。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缮,当在金初统治者将天祚帝迁葬乾陵时(1145 年)。此时,献殿主体建筑仍在,但可能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遗址出土的大量琉璃瓦等建筑构件都应是此次修缮所用材料(图七、八)。

岳天懿对医巫闾山显陵琉璃寺基址的琉

璃瓦进行研究,认为其年代下限可以到金代<sup>[25]</sup>。我们认为这是合适的。新立建筑基址的琉璃瓦与琉璃寺基址的同类器相仿,其使用时间应该也到金代。辽祖陵和辽上京遗址考古资料显示,辽代建筑基址大多用白灰做浆,铺砖或砌砖。新立建筑基址存在白灰做浆的现象。而废弃前补建的新立建筑基址台基壁面使用磨砖对缝工艺,这一现象在辽上京北城内仅见于金代大型殿址,目前所见辽代殿址尚未发现此类工艺。综合以上考古发现,有理由认为在金代早期,金人重新安葬天祚帝于乾陵时,对景宗献殿(新立建筑基址)进行了补修,并更换了殿顶瓦件。

辽显陵、怀陵、乾陵,从表面看,都安葬了2位皇帝。实际上,具体情况完全不同。辽显陵从王陵升格为帝陵,如前文所述,带有浓郁的政治意味。怀陵是第二任皇帝太宗耶律德光的帝陵,其子穆宗耶律璟附葬于此,或许是景宗“政治报复”的行为,刻意不为其叔父单独置陵地,让穆宗耶律璟与其父世宗耶律阮待遇一致。乾陵是景宗耶律贤的独立帝陵。天祚皇帝耶律延禧是被金人附葬在乾陵的,不是辽人安排的帝陵葬制。由此可知,祖陵、显陵、怀陵、乾陵实际上都是一位皇帝一个陵。庆陵则不同,陵园内有意安葬了圣宗耶律隆绪(父)、兴宗耶律宗真(子)、道宗耶律弘基(孙)三代3位皇帝。这是辽代晚期帝陵陵寝制度的新变化。

-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取得重大收获——发现一批辽代皇家建筑基址和高等级墓葬,确定辽乾陵、显陵位置,填补辽代帝陵考古的空白》,《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22日;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北镇市琉璃寺遗址 2016~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2期。
- [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取得重大收获——发现一批辽代皇家建筑基址和高等级墓葬,确定辽乾陵、显陵位置,填补辽代帝陵考古的空白》,《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22日。
- [3] 张克举《北宁龙岗辽墓》,《辽宁考古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 [4] 鲁宝林等《北镇辽耶律宗教墓》,《辽海文物学刊》

- 1993年第2期。
- [5] 万雄飞《辽宁北镇龙岗四号墓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34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
-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北镇市辽代帝陵 2012~2013年考古调查与试掘》,《考古》2016年第10期;同[2]。
- [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北镇市琉璃寺遗址 2016~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2期。
- [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北镇市新立遗址一号基址 2015~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1期。
- [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医巫闾山辽代帝陵考古取得重要收获——辽宁北镇新立辽代建筑遗址发现辽乾陵前祭殿和乾陵玄宫》,《中国文物报》2018年9月21日;同[8]。
- [1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北镇市辽代韩德让墓的发掘》,《考古》2020年第4期;万雄飞、司伟伟《辽代韩德让墓志考释》,《考古》2020年第5期。
- [11] 同[2]。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宋辽金元明卷》(下册),第8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 [13] 同[12]。
- [14] 图旭刚、万雄飞《GIS支持下的医巫闾山辽陵布局初步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33辑),科学出版社,2023年。
- [1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重要发现——新立 M1、M2》,《边疆考古研究》(第27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
- [16] 同[15]。
- [17]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0期。
- [18] 《辽史·天祚皇帝本纪》载,保大五年(1125年)“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滨王。以疾终,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统元年(1141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广宁府闾阳县乾陵傍”。《辽史》卷三〇,第351、352页,中华书局,1974年。
- [19] 岳天懿《北镇辽陵琉璃寺遗址建筑构件年代新论》,《北方文物》2022年第4期。
- [20] 《金史·萧仲恭传》载:“诏葬辽豫王于广宁,仲恭请往会葬,熙宗义而许之。”《金史》卷八二,第1849页,中华书局,1975年。
- [21] 同[8];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北镇新立

- 辽代遗址一号基址 2018 年发掘简报》,《文物》2026 年第 6 期。
- [22] 同[8]。
- [23] 万雄飞、苏军强《辽宁北镇新立遗址一号基址的性质与年代》,《北方文物》2025 年第 1 期。
- [2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辽宁北镇新立辽代遗址一号基址 2018 年发掘简报》,《文物》2026 年第 6 期。
- [25] 同[19]。
- (责任编辑:崔 焱)

##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Liao Imperial Mausoleums in the Yiwulü Mountains

Dong Xinl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of the Liao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ose in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and those in the Yiwulü Mountains. The latter, located northwest of Liaoyang Prefecture, the Eastern Capital of Liao, comprises the Xianling and Qianling mausoleums. The Xianling Mausoleum is the burial place of Yelü Bei, posthumously honored as “Wenwu Yuan Huangwang”. It was originally constructed as a princely tomb and was subsequently elevated to the status of an imperial mausoleum. His son, Emperor Shizong (Yelü Ruan), was later interred within the same mausoleum precinct. Neither of them, however, was buri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ard regulations governing Liao imperial mausoleums, reflecting strong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 Qianling Mausoleum, built for Emperor Jingzong (Yelü Xian), was instead constructed as an independent imperial mausoleum in conformity with established imperial burial regulations. It therefore differs fundamentally from Xianling, and Xianling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Qianling complex. The Xinli Building Foundation, situated at the front section of the Qianling mausoleum precinct, represents the most important architectural feature. Two large tombs (M1 and M2) were discovered to its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1 may be the underground palace of Emperor Tianzuo (Yelü Yanxi), while M2 should be that of Empress Xiao Chuo, consort of Emperor Jingzong. Drawing on the lates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Xinli Building Foundation underwent two major construction phases: the first coinciding with the burial of Emperor Jingzong, the second with the interment of Empress Xiao Chuo, and it was ultimately abandoned during the early Jin Dynasty.



## 四川成都双元村墓地 I 区战国墓发掘简报

2016 年 3 月至 2018 年 7 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成都市青白江区双元村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 270 余座东周墓葬。墓地按发掘时间先后分为两个区域，其中 I 区位于墓地东北部，墓葬年代多为战国时期。I 区 M22、M35、M82 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葬具有船棺、木椁。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其中陶器有鼎、釜、罐、豆、尊缶、浴缶、尖底盏、器盖等，铜器有铍、矛、剑、戈、钺、斤、凿、削刀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判断，M22、M35、M82 应为战国早、中期蜀国低级贵族墓葬。这三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战国时期蜀文化变迁以及蜀楚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 新疆库车友谊路墓群唐代尹公墓（M138）发掘简报

2025 年 7~12 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库车市友谊路墓群进行了第五次发掘，在友谊路和文化路交叉口西北侧、龟兹故城东城墙外 100 米处清理一座“甲”字形斜坡墓道砖室墓（编号 M138）。墓葬破坏严重，由墓道、过洞、壁龛、天井、封门、甬道、墓室七部分组成。在墓室西侧棺床上清理出两具人骨，骨骼均散乱。出土器物 17 件（组），包括陶器、铜器、银器、泥俑、墓志等。据墓志记载，墓主尹公为安西副都护、四镇支度判官、侍御史，卒于唐贞元七年（791 年）。此墓是目前新疆南部发掘的唯一一座纪年明确的砖室墓，其位置为确定唐安西都护府治所提供了关键证据。出土墓志对探讨唐中后期西域历史以及贞元年间唐对安西都护府的管辖治理等具有重要价值。

## 医巫闾山辽陵研究的几个问题

辽代帝陵可分为大兴安岭陵区和医巫闾山陵区。后者位于辽东京辽阳府西北，包括显陵和乾陵。辽显陵为“文武元皇王”耶律倍陵，由王陵升级为帝陵，其子世宗耶律阮后被附葬于同一陵区，这两位皇帝均未按照帝陵规制正常埋葬，带有浓厚政治意味。辽乾陵为景宗耶律贤陵，是遵循帝陵规制修建的独立陵园，与显陵不同，不宜将显陵归入乾陵。新立建筑基址地处乾陵陵园前部，为陵园内最重要的建筑基址，其西南和西北各发现一座大墓（分别编号 M1、M2）。本文认为 M1 可能是天祚帝耶律延禧玄宫，M2 应为景宗皇后萧绰玄宫。结合最新考古资料，本文认为新立建筑基址有两次大规模营建，第一次营建为景宗下葬时，第二次营建为萧绰下葬时，最终于金代早期废弃。